“母”字的意涵

阎晓明

今年10月6日是母校耀华中学95岁华诞。校友会两次通知写稿,先是征文,后又让我代表67届起草贺函。书写之间忽陡生一问:读过书的学堂为何要唤作“母校”?循着此疑,又催发了些许忆想……

众所周知,“老三届”在历届毕业生中可能最为特殊。而我和另外三位耀华同学,或许又称得上是“老三届”中最为特殊的。1966年6月,初二即将读完的时候,“文革”开始。由于无课可上,又因了《军垦战歌》《年轻的一代》《西去列车的窗口》的感染,高二4班的张连起,便带了我们初二4班的虞克难(《天津日报》1964年5月29日载袁静所写《一朵小红花》的主人公)、王治疆(原名王天镛,后曾协助张连起完成耀华院士塑像群,二人姓名均镌于塑像群前)和我,于1966年9月23日登上驶向河西走廊西端的列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11师3团7连(后改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916部队7连)的军垦战士。那时,我们都未毕业,甚至还是少先队员,我还担任着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劳动委员,6月停课前不久,才刚刚带领初一、初二的少先队员去水上公园种过蓖麻。

整整25年后,我从甘肃调回天津,1991年9月23日在天津市广播电视局报到时,已从不满15周岁的初中学生,变为时值不惑的中年人。尽管两年的中学生活过于短暂,却也教给了我很多很多,留下了一幕幕难忘的景象和深刻的记忆,我曾以散文《自由的天空》忆及母校美好的人和事,亦通过《书当快意读易尽》和《劳动课》描述过曾怎样从母校的图书馆和劳动课中受益终生。不过,更令我感念不已的是,在离开耀华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母校总能给我许多全新的感动、恒久的教诲。

当年在校读初中时,从未听说过老校长赵天麟在日寇特务枪口下壮烈牺牲的故事。离开母校40年后,时任校长曲丽敏命我为纪念赵校长而拍摄的纪录片《气贯长虹 光耀中华》撰稿,方对先烈事迹有所了解,母校便给了我新的教育与感动。赵天麟校长1934年到耀华工作,短短四年后,便用生命写就一篇天津版《最后一课》。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名作《最后一课》曾被多国选入课本,整个世界都为主人公的爱国情怀点赞。但,那个叫做韩麦尔的法语教师毕竟没有因捍卫法语舍命流血,而我们的赵校长却为抵制奴化教育英勇献身——津版《最后一课》实为中外教育史罕见。所以,那部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后,又作为校庆80周年纪念品制作光盘时,我为盒封写过这样的简介:“这是一个世所难见的故事——因不学日语为日方暗杀!主人公以满腔热血书写了国内外教育史上堪称罕见的一首爱国主义英雄诗篇。”更令我感动的是,1941年毕业于耀华的梁思礼院士,每次回到母校都要向赵天麟校长的铜像献花,梁院士生前接受采访时曾坦言:“南开中学遭到破坏后,当时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为了接收我们这些失学的学子入校,开办‘抗日特班’,被日军卑鄙暗杀。所以,我现在每次回到耀华,总要向赵天麟校长铜像鞠躬,怀念这位爱国烈士。”

母校给我又一次的新感动,是继开办“抗日特班”70多年后所办的12个“抗震特班”。2011年秋,母校命我再拍一部记录500多名藏族学生在耀华就读一年的电视片《民族大爱谱华章》。接到任务后,我立即赶赴学校,经对领导和师生的多日采访,了解到这一故事的来龙去脉和其中很多令人感动的细节。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地震。震后,国家决定安排震区部分教室受损、无法上课的学生,暂时前往内地就读,母校耀华便承担了这一光荣任务。为使任务出色完成,母校上上下下动员起来。2010年7月31日,时任副校长侯立瑛等赶赴西宁,与青海省教育厅、玉树州教育局共同讨论安置灾区学生的方案。8月31日,时任学校党总支书记边华一行,专程前往玉树迎接学生。9月1日,500多名玉树学生分乘15辆大客车,经18小时抵达西宁换乘火车。9月3日,这批学生终于来到耀华滨海学校。9月5日下午3时,学校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我接到拍摄任务时,这批学生即将返回家乡,但我还是幸运地参加了他们课内课外大量的各种活动,跟他们促膝谈心,熟识他们,了解他们,同他们在海河之滨的津湾大剧院一起联欢,甚至还登上他们返乡的大客车,直至北京西站将他们送上西行的列车。在同藏族学生的交往中,我再次为母校的大爱所感动。

2020年1月20日,在宁河区春节晚会的现场,因我是《于敏》诗朗诵节目的修改者和话剧《于方舟》(片段)的作者,便有幸同于敏之子于辛坐在了一起。我同他谈起了耀华。于辛说,他父亲对耀华的印象既深又好,生前曾多次谈到求学耀华是他能够考入北京大学的关键一步。于是,我向于辛郑重推荐了耀华的院士雕像群和于敏的胸像:“我每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动、新的教育,都会得到某种净化与升华。”

忆起这些,我似有所悟:母语、母校、母亲、母爱,每当面对这些冠以“母”字的语词,何以会深切体味出孕育、哺育、养育、教育的无私、伟大、厚重与恒远……

战士岩门

石磅

1974年,我们这支驻守北疆的部队开展了官兵忆苦思甜的自我教育。不久,我从宣传科听到了一条消息:某团佤族战士岩门在诉苦中讲出自己曾当过8年“娃子”(奴隶)、还被关过水牢的经历。科长指示我把它写成一个节目。

1970年参军的兵能有多大岁数?居然还当过8年奴隶?被关过水牢?一踏入连部,我就把疑问甩给了徐指导员。他认真地对我讲:“岩门是1949年5月生人,当过8年‘娃子’,他在入党志愿书中确实是这么填写的。”

“被关进水牢是啥时候的事?”

“他六岁就开始给土司头人放牛了……有一次因为豹子咬死了牛,就关了他水牢。”

“哎呀,这种经历在我们同龄人中太少见了!我一定要好好采访他。”

“你别高兴得太早,这个战士特别不善言辞,入伍四年了吧,我几乎没听见他说过一段完整的话,你交给他再重再难的活儿,他就回答一个‘是’字,转身就去干活儿了,准保完成得特别漂亮!”

徐指导员说到这儿,我抬腿就往外走,“现在就去班里找他!”

“现在找不着,他没在连队。离这儿40里地是我们连的生产基地,这不刚撒完稻种吗?迁徙的鸟儿、水鸭子啥的净偷吃,岩门在那儿盯着哪!”

第二天,我整整走了大半天才到连队生产基地,这是山间的一块小平地,开出15亩的稻田。春播刚过,水田里一行行的稻种将将发出绿芽,迁徙的候鸟在空中“嘎嘎”地叫着,不时向下俯冲要叼起发芽的稻种,只见岩门挥舞着绑上布条的树枝奔走在田埂上,大声吆喝着驱赶嘴馋的鸟儿。我上前主动介绍自己并说明来意,他只“嗯”了一声便不再言语。我看他驱鸟的任务太重,也不好意思再干扰,就跑到小河边折了一根长柳条回来跟他一起哄鸟。直到太阳落山水鸟归巢,岩门才回到小马架子前边,在石头搭起的锅灶里煮了些苞米大碴子粥,我俩就着他腌制的咸菜吃了晚饭。我以为这会儿他该接受采访了,他却拿起柳条要走,说是得整夜在田埂上待着,防止水鸟夜里来偷吃稻种,直到长成稻苗,水鸟才会飞走。

满天星斗的夜空下,我跟岩门各自挥舞着柳条,在田埂上一边巡视一边聊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解放军挺进大西南,解放了他家乡的专区、县城,岩门家寨子里的土司头人听到风声之后,连夜携着逃到边界那边的亲戚家,封闭山林中的老百姓以为他们是去串亲戚了。半年过后,头人听说大军并没开到村寨中来,便领着家眷悄悄返回来,继续对村寨实行“统治”……

岩门的祖祖辈辈都是土司的“娃子”,他到10岁时已经放一群牛了。一天,从林中蹿出的豹子咬死了一头牛,小岩门受惩罚被关进了水牢。牢里的水耗子见有人关了进来,就游上身来抓挠,咬得小岩门浑身鲜血淋淋……直到父亲找亲戚借钱赔了牛,土司才把他放出来。

岩门说他家一直住在“山卡卡”里。“什么叫‘山卡卡’”?我不解。他张开右手的“虎口”,左手指着拇指与其他四指间的空当,“就住这。”我马上明白了,那是山崖下凹进去的部位,成了遮风避雨的“岩屋”。他说入伍前从来没有穿过布衣服,一年四季只是用树叶或兽皮裹在腰间。1964年,地方政府发现岩门家的村寨还是土司头人统治着,立即进行了民主改革。1969年4月之后,他家乡才成立了人民公社,1970年岩门成为家乡第一名参加解放军的青年。

陪着岩门在窝棚和稻田里生活了三天三夜,从他嘴里就掏出这么点“素材”来。我把岩门的模范事迹仔细回想了一遍:自从驻扎到北疆草原两年多来,他就负责连队15亩水稻的生产全过程,开春之后泡田、耙地的活儿就交给他跟一头牛全干了,只有播种时全连官兵齐上阵,因为连队没钱买地膜建温床育苗,只好用人工一行行撒种。这就需要顶着冰碴光脚下水,冻得战士们总想撒尿还尿不出来。播种之后,驱鸟、移栽、补苗、施肥、拔草……岩门全包了,直到秋收时节,连队派人来收割就行了。用徐指导员的话说“就是一头一尾的活儿我们来帮一下,剩下就擎等着收大米吧!这个兵啊,一点儿也不让人操心,开春从连里背点大碴子、高粱米、大米,来到这窝棚里生活,吃菜都是在草原上采的野菜,要吃荤腥就逮点儿长虫和蛤蟆。夏天那大蚊子一个火柴盒只能装下俩,他在窝棚外边点着蒿子薰,人都薰迷糊了蚊子也不跑,咬得他浑身都是包,直淌黄水儿;风吹雨淋能没个头疼脑热吗?他就自己采草药熬了药汤喝喝……”

我噙着眼泪抚摸着岩门身上的伤疤,把脑海里他的模范事迹复述一遍,想激发他说出点儿豪言壮语来。可是岩门沉默半天只憋出半句话来:“我从小就是这么干活儿的……”

我这个战士业余演出队的创作员真是黔驴技穷了,这个歌颂英雄模范的节目可怎么完成啊?只好返回连部找徐指导员讨教。

“‘我从小就是这么干活儿的……’舞台上我要这么写出来,这英雄人物的思想境界也太低了点儿吧?”

“岩门你能真实地写出来,那就很深刻了。他从小当‘娃子’,祖祖辈辈都是奴隶,在土司头人的眼里他们是什么?就是会说话的牲口。解放军来了,他成了保家卫国的人民战士,你去问问岩门:今非昔比的生活,他愿意过哪一种?你这节目不就出来了吗?这主题还不深刻吗?”

徐指导员的点拨如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回到师部我趁热打铁,很快就写出了说唱节目《“娃子”今昔》。

家乡的渔家文化(九)

渔船名称趣话

刘翠波

周末文丛

天津滨海地区渔村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船名的来历就是其中之一。渔船的名字经历了从粗俗到规范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它的历史发展变化和脉络。

很早以前,渔村蔡家堡的渔船,都有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字,老人们说起往事,言语间尽显心酸。过去,穷人们没有文化,生活条件又艰苦,孩子们起的名字很随便,叫着也方便,尤其是有一种迷信的说法:小孩子的名字起得太高贵了,穷人家养不起,缺吃少喝天灾患病都容易夭折。渔民们给渔船起名字也源于这些道理。那时,渔民们乘船出海打鱼,危险重重,很难抵御狂风恶浪的侵袭,这种听天由命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更加迷信,在言行中谨小慎微。他们认为,如果船的名字太高贵了便难以执掌,也怕龙王老子嫉妒责难。

过去的船名,有的是船主在准备簰新船时,经过深思熟虑起的,如:小新牛、大花猪、松木篓等,这种名字大有生命力旺盛之意;有的是簰船之时,船工们根据船型随口叫出的,如:大马槽、大脑袋、大花鞋等,取平安稳妥之意;有的是船工们随意送给船主的外号,如:尖帽子、二秃子、尿盔子等;还有更随意的,如:大猛添、小道机等,它们是当年新安装的船用机器的名称。这种俗气的船名,在渔村沿用了几百年。

到了民国时期,有了船号的出现。滨海汉沽档案馆中,保存着4面布质税旗,全部由“河北省财政厅沿海船捐征收处”于民国廿二年(1933)颁发。这4面税旗全是正三角形,分别为蓝色、白色、灰色和粉色,上有“营城第三等第八七〇号船”字样,是当年国民党政府用以收取苛捐杂税的标志,但当时没能与船名挂钩。

船名的改变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渔家人的生活好了,观念也在逐渐地改变。从渔村渔业合作化开始,渔船的名字,首先是按在生产队里的排序,集体起船名,如一队的小一号、大二号、小五号等。与时俱进的是,人们的名字也起了变化,渔民少了小名和外号,开始称呼学名了。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渔船开始像汽车一样,有了统一牌照,牌照号成了船名。“津汉渔04205”是一个完整的渔船名字,“津”代表天津,“汉”代表汉沽,“渔”代表渔业生产作业船,其意义是该船拥有《捕捞许可证》。“04”是汉沽专属序列号,“200—400”号段属蔡家堡渔港的渔船所有,而蔡家堡村也拥有了160多条渔船。有趣的是,这时有些人称船长的名字,用船号的后几位数字替代,让人分不清是在说船还是在说人。从船名的演变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时代进步的足迹。

满庭芳 第五〇七八期

天津大剧院位于市文化中心的东侧,利用亲水平台创造出宽敞的公共空间,形成开放的“城市舞台”。

我的水彩近作《城市霞光里的天津大剧院》画面主体是大剧院,并由天、水、树及人物等绘画要素共同烘托意境,整体色调为较强烈的暖色调,既表现霞光笼罩的城市文化空间,又烘托了市民们游乐其中的休闲幸福时光,映射着城市定位完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

城市霞光里的天津大剧院(水彩画) 叶武 文并图

《摘金奇缘》:让世界看到亚洲的故事

曹宇田

电影频道 佳片有约

2018年上映的电影《摘金奇缘》,讲述了一位亚裔灰姑娘为爱与男友家族博弈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了新加坡这个地处亚洲、多元文化交融的国家。该片仅用3000万美元的成本,就收获了全球高达2.385亿美元的票房。影片改编自新加坡华裔作家凯文·关的小说《疯狂的亚洲富豪》,他曾用两年的时间,跟随新加坡的名流们一起生活,为小说取材,比如片中饕餮盛宴的灵感就来自于他在新加坡的真实见闻,而他本人也亲自参与了剧本改编,还全程跟随拍摄。

为了讲好这个亚裔故事,制片方还特地找来华裔导演朱浩伟坐镇。朱浩伟1979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祖籍浙江温州的父母经营着一家中餐馆,养活家里五个孩子。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朱浩伟自小便对音乐剧与电影充满兴趣,大学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影学院学习电影专业。他先后执导了著名歌舞片系列《舞出我人生2:街舞》与续作《舞出我人生3》;此后又在《惊天魔盗团2》中,展现了自己把控剧情片的实力。

《摘金奇缘》汇集了多位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亚裔演员,片中想要表达的东西方文化交融,在演员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饰演钻石王老五尼克·杨的亨利·戈尔丁,是一位混血儿,母亲来自马来西亚,父亲来自英国。在此之前,他是一名电视主持人,意外被人推荐去试镜本片,从此开启演员生涯。女一号的饰演者吴恬敏,父母来自中国台湾,她曾凭借系列电视剧《初来乍到》中的“虎妈”角色成功出圈,这一次的银幕形象却大大反转,饰演遭遇“虎妈”的儿媳妇。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女星杨紫琼一改功夫女星的形象定位,在片中饰演了一位阻挠儿子谈恋爱的恶婆婆。还有近两年崭露头角的奥卡菲娜,是一位中韩混血儿,4岁时母亲去世,自小由来自中国的奶奶带大。为了更贴近奶奶祖籍的文化,她还曾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过。

很多学者认为,亚裔一直是美国社会被忽视的族群。凯文·关也说过,他写这个故事就是为了让全世界观众看到当今亚洲的样貌。而朱浩伟在片中坚持用歌曲《流星》,来表达他对于这个世界减少仇视与偏见,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他想用这首歌把《摘金奇缘》的故事比作天空中的流星,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看到属于亚洲的故事。

10月1日22:23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摘金奇缘》,10月2日14:24“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37 出行话题

天生是配角

律师文化纵横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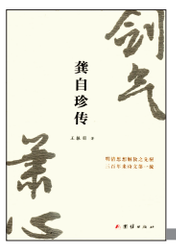
杨仲凯

作家出版社

和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律师也是要出门的,衣食住行,人之常情。但律师这个行业,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掌握专门的能力,被人家“聘请”,因而是受到一定的尊敬的。在特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委托人很可能会派车来接,以表示对专业的尊敬。律师也并非是要享受这个礼遇,如果承受了人家派车来接,实在是为了表示对人家尊敬的尊敬。现在交通更方便了,经济发展很快,律师们普遍都有自己的私家车,委托人派车来接的情况也少了。和第一批中国的私家车车主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拥有私家车的律师,通常会是一辆红夏利,后来好一点儿才是桑塔纳、捷达和富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汽车工业的不断进步,各种国产和合资新车,还有进口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也停在律师事务所的门口。上世纪90年代初,律师开上“好车”的就大有人在了,也有一些老板把二手奔驰抵作律师费交给了律师。到了21世纪初,除了一般的轿车以外,一些追求个性、标新立异的律师,也有的开上了越野车,追求商务范儿的律师会选择开一辆商务车,车上除了自己还有助理和实习律师,装得满满都是材料和案卷。还有少数律师,选择开一辆面包车,车身喷上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和联系电话,好像是在做广告,车开起来是自己流动的办公室,也是一道另类的风景。

律师们大多自己开车,聘用司机的是少数。理由一个是律师工作具有一定私密性,另外很多律师也可以让助理们帮忙开车,这样在路上还可以相互交流一些问题,再有一个也是因为律师的专业人员的身份,很多律师在内心里会觉得,专业人士,还要什么司机呀。律师去外地出差当然也会选择搭乘航班,这些年高铁发达了,选择坐高铁的律师也不在少数。很多律师界的“空中飞人”一年下来,要飞很多公里,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去出席各种会议和论坛,办理法律事务。虽然不一定准确,但衡量一个律师是不是受到一定的认可,看看他每年飞行的公里数也是个标准。一般来说飞得多,说明他的业务就多,如果他是去旅游那当然要另当别论。当然,律师做到所谓一定层级,可能他就不再喜欢“飞”了,毕竟出差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可以让年轻人去做。而很多律师的日常出行也在返璞归真,很多律师放弃开车,开始坐地铁,因为坐地铁换乘毕竟需要走路,而且地铁站换乘上来下去的,还要爬楼梯。开大奔驰或者宝马,曾经也是律师的追求和包装,现在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不再是一个律师成功与否的标志。比起一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任何的物质都是微不足道的。把脚装进鞋里,路在脚下。

69 贫病中王昙去世



龚自珍传

王振羽 著

团结出版社

王昙对龚自珍说:“要善用其才,更要善于保护自己。贤弟大作,篇篇俱佳,但我最爱《尊隐》一文。胸中风雨雷霆,托诸寓言,泣血椎心之辞,深藏嬉笑怒骂之中,给人扑朔迷离、若明若暗之感。微言大义,见智见仁,让有心人去自己捉摸,这才是最好的铠甲。这是愚兄一见之愚,望贤弟谨记。”自珍紧紧握住王昙的手说道:“兄长金玉良言,我记下了。这张银票,杭州各家银号均可兑现,兄长收下,聊沽菽水。今后有什么为难之事,尽管来找我;若不能亲来,一纸书信,弟即刻就去。您要多多保重。”自珍一直看着王昙登舟远去,才转身离开码头,回衙去了。

不想,这次分别,竟成永诀,第二年王昙就在贫病中去世了。自珍闻讯立即赶往杭州,亲自为他治丧,并按照王昙生前的愿望,把他安葬在苏州虎丘山南面。龚自珍还满腔悲愤地为他撰写了一篇含意深刻的墓志铭。

葬罢王昙,自珍回到上海,又潜心于书斋,读书著述。他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仁泣亭文集》。嘉庆二十三年(1817),夏璜进京铨选县令,特地绕道上海来看望自珍。这夏璜,是浙江钱塘人,嘉庆十年进士,长自珍十七岁,是自珍的又一忘年交。他好读史书,尤其爱读《左传》,能够一字不漏地通篇背诵。自珍十六岁时,随父亲在京,家居法源寺附近。夏璜去拜见自珍的父亲,适逢其父不在家,就和自珍闲聊起来。他十分喜欢自珍的聪明颖悟,尽管年龄身份悬殊,但十分投缘。自珍常常提出一些幼稚但又难以回答的问题,向这位新科进士求教,有时甚至会使这位饱学进士受窘、难堪。但夏璜全不放在心上,一定查找典籍或向人求教后,再给自珍解答。不知不觉二人竟成了不拘形骸的忘年之交。那年自珍随母亲回杭州,恰巧夏璜也在杭州,二人把酒论史,相互辩难赌输赢饮酒,自珍一连提出三百多条历史典故,都未能难倒夏璜,使得自珍倾心折服。像这样两榜出身的饱学之士,却仕途蹭蹬,至今屈居下僚,自珍深为老朋友愤愤不平。在自珍的书房里,二人把酒谈心。自珍说道:“兄长两榜进士,学富五车。为何时至今日才有铨选的机会?”

夏璜浅啜一口,满脸苦笑,说道:“贤弟难道没有听说过和珅当政时,厌恶书生的事?在他属下,学问越大越难升迁。一次皇上问他最讨厌什么样的属下,他脱口说道,最讨厌书生。乾隆皇帝听后十分不悦,说道:‘朕就是书生。’和珅知道说走了嘴,连忙叩头谢罪,但事后仍然视书生为异己,直到倒台。”

24 跤场角力

警 卫

晓 重著

作家出版社

郭玉昕清楚地记得成玉坤遗体的位置和模样,而且每次想起来都会不寒而栗。有时候,他会在心里暗暗问自己:你见过的血腥场面和凌乱现场也不少,为什么偏偏忘不掉这个现场?成玉坤牺牲了,但始终没定性为烈士,师门里除了李正弘之外,都觉得大师兄应该是烈士,但他的确已离开警卫的工作岗位。想到这,郭玉昕无奈地摇摇头。这时,门外有人喊着他的名字走进来,他抬头看了一眼便急忙起身迎接。来人叫韩胜喜,是他在古文化街的邻居,也是他的玩友和朋友。

郭玉昕和韩胜喜相识纯属偶然,以他郭玉昕在这条街上的震慑力和影响力,无论如何也不会主动去结识韩胜喜的,那天要不是“熟梨糕”跑来,让他去跤场看看有个生瓜蛋子要踢“大力丸”场子,他也不会认识韩胜喜。“熟梨糕”是特色小吃店的店主,“大力丸”是跤场的负责人。“熟梨糕”的店铺开在跤场旁边,有个风吹草动准是他第一个跑过来报信儿,比打电话还快。他跟着“熟梨糕”来到跤场,正好看见韩胜喜三下五除二撂倒了“大力丸”最后一个徒弟。熟悉跤场规矩的人都知道,不管因为什么,人家来跤场和你撂跤,把徒弟摔了一溜够,等于是拆了师傅的四梁八柱,结果只能是师傅亲自下场比拼。赢了自然皆大欢喜,可要是输了,那以后就没脸杵在这了。看着“大力丸”有点儿尴尬且面露怯色,郭玉昕分开围观的众人,要上场去会会这个生瓜蛋子,同时也帮自己的朋友“大力丸”撑个场面。

两个人掼跤前,得依旧礼抱拳拱手道个姓名,或是有专门的人来介绍。可郭玉昕完全不理这一套,接过旁边跤手递过来的褡裢,穿上便直奔着眼前的生瓜蛋子走过去。果然,对方被他扑面而来的刚猛逼得后退了两步,但随即伸出手臂迎上前来。两人搭手入扣扭在一起的时候,郭玉昕伏在对方耳边问了句:“哪儿的?”对方回答:“柳青的!”交换了个身位郭玉昕又问:“没听说柳青出好把式?”对方回答:“你这不就看见了吗!”两人闪转腾挪几个回合,郭玉昕感觉对方没什么太多的招式,就是力气大。郭玉昕先是卖个破绽,借力打力摔了对方一个“别子”,紧跟着又是一个“大背胯”,摔了对方一个四仰八叉。按照规矩,三局两胜对方已经输了,就在郭玉昕抱拳拱手接受四周喝彩时,那人走过来说:“你是高手我佩服,不过还有胆子再来一局吗?”郭玉昕挑了挑眼眉,没说话。对方说:“我摔跤摔不过你,咱们换个花样。”郭玉昕手指跤场里所有的家伙什说:“这里的东西你随便挑!”对方扬手指着场外说:“不在这比试,咱们去找个文雅点儿的地方。”